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四四期 ——
(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5d)

【史海钩沉】	1967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	董国强 • Andrew G. Walder
【书刊评论】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施滨海
【问责历史】	谁能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	文 贝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1967年南京“一月革命”的失败

• 董国强 • Andrew G. Walder •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许多学术论著都将“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派性武斗描述为试图捍卫现有政治体制的“保守派”集团和试图改变现有政治体制的“激进派”集团之间的斗争。然而近年来的一些著述却指出，政治冲突的轴心在1967年初各地党政机构垮台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与上述解释体系的核心观点相互抵牾。深入考察1967年1月南京夺权的失败，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事实上，夺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将那些地方党政机构的捍卫者们赶下政治舞台，并导致卷入夺权事件的造反派阵营的两翼公开决裂。先前的造反派盟友转瞬间反目成仇，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在艰难曲折的北京谈判中不断加剧与固化——而北京谈判之所以艰难曲折，是因为中央的政治导向常常发生令人困惑的转变。引起纷争的，不是“保守派”和“激进派”关于重建政治秩序的不同主张，而是相互敌对的激进派别在新的权力架构中的不同地位。

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存在着一个广泛共识——即“文化大革命”头两年的群众派性冲突是“保守派”和“激进派”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目的在于塑造有利于自己的运动结果。按照这种解释，处于政治制度顶端的毛泽东和从属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激进官僚们，在林彪和人民解放军若干重要单位的支持下，与地方上的造反派组织——其成员主要来自在现行体制

中处于边缘或从属地位的社会团体——结成同盟。游离于这些激进势力之外的，是那些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官僚和地方上的军队领导人——他们与那些在现行体制中受到偏爱的社会团体成员组成的群众派别结成联盟。（1）当一些西方学者以十分肯定的口吻提出这种解释体系时，他们还无缘接触“后毛”时期大量涌现的历史文献、回忆录和重要人物口述史料。然而它却长期广泛流传，并被英语学界奉为有关那段历史的标准叙述。（2）到了“后毛”时期，这种解释又受到一些曾在“文革”期间风云一时、而后流亡海外的中国作家的盲目追捧，因而其可信度似乎得到进一步确认。（3）

然而最近一些年来，这个曾被广泛接受的共识受到挑战：挑战针对的不是它对北京领导层中政治分歧的刻画，而是其对省级和省级以下政治对垒的描述。徐友渔曾尖锐地指出，这种解释过分夸大了与“社会冲突”相关的有限证据，混淆了1966年下半年“保守派—造反派”之间的分野与1967年1月夺权以后“激进派”组织之间的对抗。徐指出在1966至1967年间，在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只有6个地区可以认定自始至终存在着“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概念划分。（4）Andrew Walder关于北京红卫兵内部冲突的研究论著，细致描述了“天派”和“地派”之间的长期斗争。这两派的政治分歧似乎与一般认定的“激进”或“保守”概念毫不相干。（5）卜伟华在其新近出版的“文革”研究专著中没有涉及上述理论问题，不过他对1967年许多地方省级权力斗争的概述支持徐友渔的结论。（6）

通过对南京“一·二六夺权”前后政治冲突的详实考察，我们将更加深入地探讨上述问题。事实上，这起夺权事件导致当地群众派性组织分化重组，并在此后两年持续影响着地方派性政治。卷入这场争斗的造反派们先是在推翻江苏省委的斗争中结成联盟，而后又在北京大人物策动的仓促夺权行动中发生分裂。他们之间的对抗与首都的派性政争相互牵扯，后者激化与固化了本来十分细小的分歧。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重建政治秩序问题上的原则冲突，而是一系列含义模糊、变化无常的政治博弈。这样的政治博弈很难用“保守的”或“激进的”概念加以定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叙事将向人们揭示，一场起初由现行体制攻击者挑起的反对现行体制捍卫者的斗争，是如何迅速转化为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斗争的。

◇ 1967年江苏“夺权”的背景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得到最高当局的赞赏，引发了一波席卷中国大地的群众夺权浪潮。尽管当时的舆论宣传充斥着“群众运动”的激进修辞，毛泽东却始终坚持党政官员和军队干部在“革命委员会”中的主导地位。接踵而至的，是对具有独立倾向的激进组织的大力遏制。上海“一月风暴”本质上是由张春桥（他身兼上海市委和北京“中央文革”双重领导职务）领导的一次旨在打倒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体制内政变。张的成就主要表现为重建地方秩序、收服工人运动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7）

中央领导层导演了上海的夺权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实现了预期目标。该市在夺权后没有像中国其他地区那样陷入派性武斗的泥潭。上海模式中的一些关键因素显然具有排他性：毛毫不含糊地支持张春桥成为新的地方领导人，中央高层在迅速恢复当地秩序的问题上存在共识，造反派势力在听命于北京的造反派头头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在上海1月6日事件得到媒体赞扬后的30天内，其他23省的首府也宣布夺权。然而在1967年的头11个星期内，北京当局只承认其中4省夺权合法。（8）在这几个省，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都选择一位政治姿态激进、得到他们信任、同时具有相当地位和经验的省委领导人重建秩序。（9）其中最后一个获得迅速承认的是3月18日山西夺权。此后直到8月，其他各省的夺权都没有得到中央确认。与此同时，地区性的权力斗争在全国范围爆发。（10）

如果没有北京的明确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队方面的支持，任何夺权行动都不会成功。这

需要地方参与者与中央领导人之间的紧密配合。在中央，发挥重要作用的是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他们向毛泽东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常常显示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导向，然后由毛做出最后的决定。（11）周恩来的优先考虑是尽快重建地方权力机构和恢复交通与工业生产——这两者都在1966年下半年遭到严重破坏。周在1966年秋天曾试图阻止造反运动向工厂农村蔓延，但是没有成功。当动乱急剧升级后，他变换策略转而积极鼓励造反派“夺权”，以便在“夺权”后迅速重建地方权力。另一方面，“中央文革”的当务之急则是确保新的掌权者效忠于他们和他们的主张。他们并不急于重建秩序。上述两种考量之间的相互抵牾是显而易见的，因而“中央文革”疑虑周恩来是否会因权宜之计而牺牲政治原则。中央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常常导致僵局，很多问题久拖不决，连毛泽东也很难迅速做出决断。在南京个案中，北京高层的内部冲突和优柔寡断，使得与“夺权”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变得含混不清，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

南京个案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复制上海模式如此困难——以及为什么那些激进团体会在推翻地方当局后如此迅速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派。1967年1月26日，当地一个庞大的造反派联盟宣布夺权。这促成在北京举行的任命新的地方领导班子的艰难谈判。南京的造反派们无法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选择哪位地方干部担任过渡权力机构一把手的问题上意见相左。僵局加剧了江苏的派性斗争，迫使北京于3月5日宣布该省实施军管——派性冲突受到遏制，但未得到妥善解决。

我们能够对南京的情况做出深入分析，是因为我们所占有的资料一般而言较为稀缺。其中包括一套近乎完整的《八·二七战报》——由当地一个主要派别主办的报纸——和一部由南京市档案馆在1980年代中期编印的《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当时只印发十本向各方征求意见，后来也没有机会公开出版。此外，我们还拥有北京谈判期间当地造反派头头与中央领导人多次会谈的记录，近年来公开出版发行的回忆录和大事记，以及第一作者与许多亲历这些事件的主要造反派头头的访谈资料。

◇ 南京地方党政机构的垮台

“夺权”一词的本意是用武力推翻当局。然而南京的地方政权在1966年年底已经近乎彻底瘫痪。（12）这个过程始于11月，当时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们不得不多次陪同造反派赴北京请愿。（13）到12月底，造反派们包围省委大院，要求领导干部们出席批斗会、坦白交代罪行、与造反派签订协议。这些行动引发了保守派工人组织“赤卫队”与造反派之间的街头对垒。他们也派人前往北京请愿。（14）在毛泽东肯定了1月4日和6日上海两大报刊夺权以后，南京的保守派组织放弃了抵抗。（15）他们的最后抗争是所谓“一·三事件”——期间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在市内发生武斗，造成铁路交通和长江航运的阻断。（16）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于1月22日向北京发出特急电报，报告省委已经停止工作。（17）从那天起，省委书记处成员江渭清、陈光、许家屯和彭冲等人遭到造反派监禁，并经常被拉到群众大会上批斗，还被迫在脖子上挂上牌子游街示众。（18）一个大型造反派联盟组织——“江苏省红总”——开始代替江苏省委发号施令。（19）

1月17日，当地造反派几大组织的代表们决定成立“江苏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文凤来和张建山当选主要头头。文凤来是南京大学政治系讲师、“南大红色造反队”一把手和“江苏省红总”的后台老板。（20）张建山是南大数学系高年级学生、“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重要领导人。（21）造反派控制了大众传媒，但他们并未打算向省委夺权。与北京的情况一样，南京造反派势力的发展壮大，是其核心成员在“文革”初期遭受工作队惩罚后不断抗争的结果。（22）一旦他们从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平反和道歉，他们的核心诉求便得到了满足。他们期盼的不是夺权，而是由中央罢免那些最坏的地方官员，同时对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组织予以承认和保护。

◇ 周恩来的意外介入

南京的造反派们是在周恩来的反复敦促下实施夺权的。这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因为周恩来一直努力抵制“中央文革”的激进主张。然而他的行动其实并不难理解。南京的地方政权已经垮台了，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变得一团糟。在毛泽东肯定上海夺权之后，重建秩序的唯一途径便是诱导造反派联合“革命干部”和当地驻军实施夺权，而后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周的介入是为了加速这个进程并达成预期的结果。

周恩来于1月中旬主动联系葛忠龙。葛是“南大八·二七”的发起人之一。几个星期前，他前往北京状告南京地方当局，得到过周恩来的接见。（23）1月16日，周的一位秘书打电话给葛，告诉他南京造反派应该尽快提交一份夺权方案。葛立即向其他造反派头头传达了 this 信息，同时也向高啸平、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等人做了通报。高啸平是较早支持造反派的省委干部。（24）梁、杜、吴是南京军区干部，曾任省委驻南大工作队副队长，于1966年秋表态支持学生造反派。（25）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驻南京的“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也接到葛的通报。（26）邢文举随后起草了一份夺权方案。（27）1月21日，周的秘书再次致电葛忠龙，敦促造反派们加快行动步伐。（28）

周恩来还在1月中旬打电话给“八·二七”的另一个头头曾邦元，询问他对上海夺权事件的看法。（29）曾回答说：“我们支持中央的决定，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周随后问曾，南京的造反派是否也准备夺权。在得到否定答复后，周问：“那你们如何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决定呢？”曾回答说，造反派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管理江苏。停顿了一会后，周在电话那头解释道：所谓夺权，并不是真地要造反派们接管政府，而是要他们监督那些在任的官员做好工作。曾回答：“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可以夺权。”周随后指示曾邦元与南京军区取得联系，尽快提交一个夺权方案。周还于1月23日打电话给南京军区干部梁辑卿，表扬他和南京军区“帮助揭开了江苏阶级斗争的盖子”，并要他们考虑一下夺权问题。（30）

周恩来的上述举动与1月22日《人民日报》相互呼应——该报当天在头版发表了三篇文章，号召所有“无产阶级造反派”奋起夺权。（31）22日下午，周恩来和陈伯达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头头。周在讲话中强调，（一）各地的夺权必须以造反派的大联合为基础；（二）各政府机关内部的造反派应该在夺权中发挥主导作用，社会上的造反派予以协助；（三）各级政府官员在夺权期间应该坚守岗位、继续履行其日常工作职责，并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32）在周恩来和《人民日报》的激励下，南京的造反派开始行动。1月22、23和24日，造反派头头们开会商议夺权事宜。《解放军报》记者、“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出席了这些会议，并起草了一个“夺权委员会”名单。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也出席会议表示支持。会议期间，以文凤来为首的“夺权委员会”宣告成立。

这些会议种下了造反派不和的种子。若干重要组织的代表指责会议“缺乏民主”，反对“夺权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宣布退出会议。结果，“南大八·二七”的头头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曾邦元——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33）夺权议程继续推进，但造反派队伍现在分裂为两派：一派参加了夺权行动，而另一派则没有。

1月25日午夜后不久，“夺权委员会”派出一万多名造反派成员分赴省市下属的各个机构夺权。（34）南京军区事先得到通知，届时宣布实施宵禁，以确保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不受阻碍。（35）其实当地党政机构早已瘫痪，根本无法组织任何抵抗。所谓“夺权”行动虎头蛇尾，不过是在政治上走个过场。

“夺权委员会”事先向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报告了夺权方案，并获得他们的批准。（36）然而造反派阵营的分裂违反了周恩来关于夺权的首要原则——造反派的大联合。参与夺权的造反派们在南大召开会议庆祝他们的胜利。中途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指示与会者们暂缓对外宣布夺权。经过一番讨论，他们还是公开宣布了夺权的消息。（37）随后张建安代表“夺权委员会”致电总理办公室说明情况，试图争取他的支持。（38）

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受到北京电话指示的鼓舞，冲进《新华日报》社阻止该报发布夺权消息。1月28日凌晨，周恩来的秘书又打来电话说，由于造反派们意见分歧，中央准备召集各有关方面代表赴北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谈组建过渡权力机构事宜。（39）尽管如此，夺权派们还是在1月28日《新华日报》上发布了夺权消息，并于1月30日在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庆贺夺权成功的群众大会。（40）南京军区派出4000名指战员参加大会，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在会上发言支持夺权，会后还在市区举行了军民联合武装大游行。（41）

周恩来首鼠两端——先是策动夺权，而后又拒绝赋予其合法性——似乎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当然是夺权前夕造反派阵营的分裂。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缺乏一位中央了解并信任的高级官员去领导新的权力机构。南京造反派领袖文凤来不过是一名普通党员、退伍转业军人和大学讲师。“夺权委员会”核心成员中没有一位高级党政干部或军队将领。周恩来策动夺权的目的在于重建秩序，而现在的情况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周的后续干预显示，他当时最关心的是过渡权力机构的“一把手”人选。

◇ 艰难的北京谈判

周恩来指示南京军区组织一个代表团赴北京。他强调这个代表团必须包含支持和反对夺权的两派造反派代表、原省委领导干部代表和南京军区的代表。（42）杜方平大校受命组建代表团，并担任军方代表。原省委书记处成员李士英和包厚昌被选为“革命干部”代表。（43）文凤来和其他几位来自高校、工厂和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头头被选为“夺权派”代表。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希望由曾邦元代表他们，但是遭到夺权派的激烈反对。最终，南京大学生物系调干生、“八·二七”二号人物袁服武和来自其他高校的两造反派头头当选“反对派”代表。周恩来事先审阅了代表团名单，下令在名单中增加原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44）

江苏代表团于2月7日抵达北京，那些赞成夺权的代表团成员对获得中央的支持信心十足。然而他们的信心很快便发生动摇。代表团住进宾馆的当晚，便有一位自称是中央办公厅干部的人造访。他说他要护送李士英去见“一位中央高级首长”。他拒绝回答为什么中央首长要单独接见李士英，他要去见哪一位中央首长，也拒绝了其他人陪同李士英一起去见那位“中央首长”的请求。结果代表团没让他带走李士英。（45）

第二天，周恩来和谭震林召见江苏代表团。造反派们对随后发生的事情深感意外。周恩来一上来便拿出最新一期《红旗》杂志，指着上面的社论《论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和革命权威》（46）说道：

你们夺权我们已经看到，中央要经过与你们会谈才能表示支持或不支持。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领导，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没有解放军的大力支持，又怎么能够夺权呢？今天的夺权，是1949年夺权斗争的深入和继续。但情况不同了。主席批示我，各省夺权后，要一个一个地接见。昨晚我委托康生同志先找李士英同志来谈一谈，你们要派人来监视，来记录。我们这样支持你们，你们这样不尊重我们，我很难过。你们……给不给中央权力呢？（47）

造反派们现在才意识到，中央谋求在各地夺权问题上的绝对权威。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转呈了谭震林、陈毅等人联名起草的一份请示报告，建议将十多个省的省委领导人——包括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召到北京加以保护。（48）2月8日，南京军区派人前往南京炮兵指挥学院，将被造反派关押在那里的江渭清解救出来，并用专机送往北京。江渭清在北京接受了体检，又洗了澡刮了胡子，然后被安顿在京西宾馆休息。（49）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周恩来和谭震林多次与江苏代表团内的不同群体举行会谈，促使他们达成共识。（50）周和谭的意图很快便清楚地显现出来：他们希望江渭清成为过渡权力机构的“一把手”。2月9日，谭震林单独召集旧省委干部和杜方平开会。他轻描淡写地批评了江苏省委的政治错误，同时强调江渭清是近年来敢于质疑刘少奇“桃园经验”的少数几个省委书记之一。他随后提出以江渭清为首的新权力机构的组阁方案。（51）

周恩来在与造反派头头的一次私下接触中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他告诉他们，《红旗》杂志即将发表一篇正确处理干部问题的新社论。（52）在解释该社论的内容时，周说：“我们必须正确对待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老干部参加新的权力机构对我们的夺权斗争有利，因为这些老干部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很强的组织能力。”（53）周还告诉造反派：江渭清同志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革命”，对党忠诚，所以中央打算让他领导新的革命委员会。（54）

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尽管代表团中的那些旧省委干部立即同意周、谭的提议，其他很多人却对此持强烈的保留态度。文凤来和杜方平对周、谭的提议深感困惑和不安。据史料记载，文凤来在一次会议上与谭震林发生争执，强调江渭清的错误非常严重。（55）杜方平不敢直接顶撞周恩来和谭震林，但他内心不满、试图拖延。当周恩来催促他表态时，杜方平推托说需要先向南京军区首长请示。（56）周恩来立即反问道：“我现在代表中央处理江苏问题，你认为南京军区领导敢反对中央吗？”（57）

最终，支持夺权的造反派们迫于中央的压力同意了这个提案。周恩来和谭震林于是安排江渭清的秘书班子进京，替他起草未来在群众大会上站队亮相的自我批判发言。（58）至此，一个由原省委领导干部、军队“支左”干部和愿意合作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新的江苏地方权力机构可谓呼之欲出。

◇ 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

在江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期间，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组织了自己的代表团——“江苏控告团”。这些造反派也在推翻南京地方政权的斗争中扮演了领导角色。当地第一个群众组织——“南大红色造反队”——成立于1966年8月23日。南大政治系讲师、共产党员文凤来是该组织主要领导人。第二个造反派组织——“南大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于4天后宣告成立，主要头头是数学系青年教师曾邦元。这两个南大造反派组织联手打败了支持省委的“南大红旗战斗队”。然而到1966年11月造反运动溢出大学校园后，这两个同盟组织为扩大各自的社会影响力而展开竞争。不久他们分别组建了两个全市性的造反派联盟：一个是以“南大红色造反队”为首的“江苏省红总”，一个是以“南大八·二七”为核心的“南京八·二七”。这两大联盟组织合作打垮了保守派联盟组织“南京厂矿企业工人赤卫队”。然而共同的敌人刚刚消失，他们之间围绕省市群众运动领导权的潜在竞争便再度升温。一些“八·二七”头头——如曾邦元和袁服武——反对“省红总”方面提出的夺权动议。然而对他们来说很不幸的是，夺权行动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反对半途而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错失良机，“八·二七”的两个头头张建安和葛忠龙临阵倒戈，支持夺权。

因为“八·二七”和它的几个同盟组织从夺权行动中退出，所以他们在由28人组成的江

苏赴京代表团中仅占3席。为表达不满，他们在南京掀起一轮宣传攻势，指责“一·二六夺权”反映的是少数造反派头头的政治野心，而非广大群众的意愿。支持夺权的造反派们随即对他们上纲上线，宣称“谁反对‘一·二六夺权’，谁就是反革命！”〔59〕

周恩来和南京军区对“八·二七”方面节外生枝心存不满，然而他们得到“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的支持。像邢文举这样的“中央文革记者站”派驻各地记者，其使命原本仅限于向中央汇报各地造反运动的开展情况。但事实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与当地群众组织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并积极支持他们的造反活动。邢在南京便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他起草了江苏夺权方案，并参与策动当地造反派夺权。他注意到“南大八·二七”的组织规模大大超过了其校内竞争对手“南大红色造反派”。在1966年秋天，南大造反派学生组织1300多人前往首都控告南京地方当局所作所为时，公开打出的旗号是“南大八·二七”。所以许多中央领导人一谈到南京的造反运动便会联想到这个名字。〔60〕不过“红色造反派”的头头文凤来是南京最著名的造反派领袖。他是南大最早起来批评工作队的少数师生之一。1966年8月他赴北京告状时，被康生指定为“革命教师”代表，在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天《人民日报》的报道中还特别提到他的名字。〔61〕因而在邢文举看来，新的权力机构应该包括文凤来（杰出的造反派领袖人物）、“八·二七”（革命群众组织的楷模）、以及高啸平（“革命干部”代表）和梁辑卿、杜方平、吴大胜（军队干部中的“左派”代表）。〔62〕

邢文举的看法与周恩来的组阁设想相左，导致他们之间关系的疏远。周恩来让南京军区一一而非“中央文革”代表邢文举一一组建江苏代表团就是一个明证。邢文举对“八·二七”头头曾邦元和与“八·二七”关系密切的省委“造反”干部高啸平被排斥在江苏代表团之外非常恼火。他没有随同按照周恩来意图组建的“江苏代表团”赴京汇报夺权情况、商议组阁方案，而是帮助曾邦元和高啸平组织了一个“江苏控告团”赴京反对夺权。

“江苏控告团”于2月10日抵京后，周恩来起初拒绝接见他们。他们不得不自己寻找住宿的地方，在“全国总工会”办公大楼里打地铺。〔63〕不过“中央文革”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安排他们到北京航空学院招待所住宿。〔64〕江青和康生还在钓鱼台秘密接见了南京左派干部高啸平。〔65〕得知这个情况后，周恩来立即与“控告团”取得联系，让他们搬到更为舒适的居所——京西宾馆。〔66〕

深谙权变之道的周恩来最终同意“控告团”成员参加谈判会议。〔67〕出于他预料的是，“控告团”绝大多数成员立即表态支持江渭清复出的方案。〔68〕“控告团”需要得到中央高层的支持，只要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在新的权力机构中掌握实权，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解决方案。然而激进干部高啸平反对江渭清复出。他已经接受“中央文革”的指派，秘密调查江渭清涉嫌一项派性谋杀阴谋的指控。更重要的是，高啸平知道一旦江渭清重新掌权，他必定会遭到打击报复。周恩来对高啸平非常恼火。他强调高的职位太低不能代表省委领导层。他还明确责令高脱离“控告团”返回南京。〔69〕

◇ “中央文革”的动作

周恩来扶植江渭清复出以稳定江苏局势的努力，很快便因中央领导层的内部冲突而搁浅。2月16日，著名的“怀仁堂事件”发生——这个事件是随后反击“二月逆流”运动的前奏。在当天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和徐向前因不满“中央文革”成员攻击老干部，与之发生激烈对抗。〔70〕毛认定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于19日在他的住所召集政治局会议，责令谭、陈、徐三人停职反省。〔71〕谭震林拒绝反省自己的错误，还在激愤之下致信林彪，表示要与“中央文革”那帮激进分子斗争到底，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72〕

毛泽东更加震怒，指示周恩来召集一系列政治局会议批判谭震林。这些会议始于2月25日，导致周恩来稳定江苏努力的失败。（73）

谭震林协助周恩来处理江苏问题，积极支持江渭清复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1950年代初期，江渭清曾在谭震林领导下工作。（74）谭震林遭到贬斥后，“中央文革”不但否决了江渭清复出的方案，而且试图借助这个事件扳倒周恩来。2月25日，江青和康生将江苏省委第二书记陈光召到钓鱼台。他们告诉陈光，他们正在调查江渭清复出的幕后主使。陈光为了保护周恩来，把责任全部推到谭震林头上。据说康生很生气。他指着陈光的鼻子大声呵斥道：“你陈光，不光明磊落！”（75）高啸平告诉其他“控告团”成员，谭震林犯了严重错误，“控告团”应该将谭在北京谈判期间的所作所为写个材料，上报“中央文革”。（76）3月2日，“中央文革”成员接见原“江苏代表团”成员，透露了一个新的决定。他们说江渭清已经被打倒，希望代表团在原省委领导干部中推荐一位“革命干部”担任新的“三结合”权力机构一把手。王力暗示代表团提名他们的对手高啸平，但是没有得到积极回应。（77）

◇ 僵局：江苏军管

当两派代表在北京谈判期间，南京的局势逐渐失控。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力冲突不断加剧，双方都想通过武斗削弱对方实力，从而对北京谈判施加影响。（78）许多其他省份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周恩来迫于形势，自2月26日起连续召集军队高级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提出了处理各省夺权问题的新办法。在3月份出台的一份文件中，中央高度赞扬了各地的群众造反运动，同时对造反派之间的分裂和对抗提出严厉批评——指出“走资派”利用造反派的分裂对抗搞“假夺权”，挑起武斗事件，使得各地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因而，中央决定派出军队“支左”，并在一些地方实施军管。今后各地夺权要采取“三步走”的办法，即首先将权力全部集中到军队手里；其后由军队将权力移交给由群众组织代表、军队干部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组成的“三结合”过渡权力机构；最后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产生永久性的革命权力机构。（79）

江苏于3月5日被置于军管之下。当天，周恩来和康生联袂接见江苏代表团和江苏控告团全体成员，宣布中央将与南京军区进一步商讨新的权力机构组成办法。（80）两派代表除了表示支持中央决定之外没有其他选择。历时近一个月的谈判到此结束。3月10日，“江苏省军管会”宣告成立，南京军区政委杜平被任命为“省军管会”主任。“夺权委员会”被勒令解散。（81）当地公安机关和报纸电台被军队接管。工厂、车站、码头、邮局等单位也派驻了军代表。造反派头头们被组织起来办学习班，批判检讨自己的错误。（82）

◇ 结论

南京夺权的失败，有助于大大深化我们对各省派性政治的认知。需要首先指出的是，在周恩来介入之前，南京的造反派们并未想到过夺权。大量访谈资料显示，造反派们觉得一旦他们从先前打击迫害他们的地方当局那里获得平反和道歉，摘掉了对他们不利的政治标签，他们的主要目标便实现了。他们努力寻求的，是证明其先前反抗行为的正当性，而非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激进变革。夺权是北京的主意。

其次，是导致1967年造反派分裂的因素。夺权问题上的公开对抗源自1966年下半年两大造反派联盟之间的微妙竞争。当“八·二七”因反对其竞争对手的主导地位而宣布退出夺权行动时，他们突然面临被边缘化的处境。他们其实并不反对夺权，他们所反对的是其在夺权行动中被赋予的从属地位。在他们因否定夺权而被视为“反革命”遭受打压时，他们全力以赴进行抵抗，正如他们先前抵抗南京地方当局强加给他们的罪名一样。他们显然不愿意在获得

当局的平反和道歉之后，再被昔日的盟友贴上同样的标签、施以同样的压迫。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裂与他们1966年12月间同捍卫省市的“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存在根本性的差异。我们无法将这种新的派性分野中的一方或另一方界定为“激进派”或“温和派”。这些标签在南京语境中变得毫无意义。由周恩来策动的夺权行动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造反派们是否知道周恩来打算让江渭清复出？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们是应该被归类于“激进派”——因为他们反对重建秩序？还是应该被归类于“温和派”——因为他们赞成周恩来扶植江渭清复出的计划？处于对立状态的造反派组织出于策略考虑而频繁地变换各自的立场，使得我们无法给其中任何一方贴上那些政治标签。然而他们之间的分野却是真实的和易于感知的。

第三，是关于南京夺权失败的原因。南京的夺权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北京高层无法在选择哪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出任新政权“一把手”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都无意让一位造反派头头领导新的地方权力机构——这无疑反映了毛泽东的个人看法。周恩来希望江渭清复出，而“中央文革”则属意于高啸平。周恩来显然十分讨厌高，并且认为他的行政级别不够，而实施夺权的造反派们则将高看作自己的对手。反过来，“中央文革”无法容忍江渭清的复职，利用谭震林的落马挫败了周恩来的努力。然而他们却无法让代表团——或者，显而易见的，让毛泽东——认同高啸平。在这样的僵持中，南京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唯一的权宜之计是将江苏置于军管之下——实际上是将新政权的组建无限期地搁置起来。此举虽然暂时遏制了派性武斗，却无法实现长治久安——当军方的权威在1967年的一系列事件中遭受破坏之后，当地的派性武斗死灰复燃。（83）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1967和1968年困扰中国的群众派性冲突是否可以被准确无误地界定为“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斗争？至少南京的情况不是这样。造反派阵营内部两股势力的分歧直到夺权前夕才公开爆发出来。而且2月中旬的北京谈判似乎正朝着解决分歧的目标迈进。归根结底，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摆平两派在新的权力架构中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主张。两派都同意江渭清出任革命委员会一把手，尽管其中一方并非心甘情愿。而且双方都不反对军管。只有省委干部高啸平竭力反对周恩来的计划，并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他们将周恩来的努力视为一种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复辟企图。当周恩来的计划因谭震林的清洗而遭受挫败之后，毛和周转而采取一种牵制策略——即实施军管。然而让军队置身于悬而未决的派性斗争之中，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本文译自英文，原标题为Nanjingian's Failed "January Revolution" of 1967: The Inner Politics of a Provincial Power Seizure 刊载于英国剑桥大学主办之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3, September 2010, pp. 675-692。第二作者Andrew G. Walder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资深教授、国际知名“文革”研究专家。

注释：

(1)有关这种解释的经典表述，参见Hong Yung Lee,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esp. pp. 5-6。后来发表的许多论著都对此加以引述。

(2) 详见Ba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Ten Years of Turbulenc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3); Harry Harding, "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in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2-166; 以及Maurice Meisner,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rd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3) 详见 Hua Linshan, *Les Années Rouges*, trans. Henri Leuwen et Isabelle Thireau.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华林山:《文革期间群众性对立派系成因》, 刊载于刘青峰主编《文化大革命: 史实与研究》,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 刘国凯:《广州红旗派的兴亡》, 香港: 博大出版社, 2006。

(4) 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 第 18-21 页和第 81-109 页,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9。

(5) 详见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此前的许多论著往往认定“天派”为“保守派”, “地派”为“激进派”。参见 Le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p. 216-229。

(6) 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第 383-428 页,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8。

(7) 详见 Andrew G. Walder, *Chang Ch' un-ch' iao and Shanghai' 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8), 以及 Harding, “The Chinese State in Crisis,” pp. 152-166。

(8) 北京、天津、内蒙、福建和湖南五地没有发生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夺权。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第 383-428 页。

(9) 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因模仿毛泽东公开支持造反派, 在该省的“夺权”事件中幸存下来。其他几位幸运儿则在关键时刻向其顶头上司造反: 他们是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 山东青岛市委副书记王效禹; 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晗。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第 304-308 页和 383-392 页。另见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 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71-173。

(10) 在北京, 造反派组织在 1966 年底打败其“保守派”对手后立即发生分裂, 无法联合起来实施夺权。作为替代, 毛泽东指令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于 4 月间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组建了一个革命委员会。详见 Andrew G.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h. 8。另见卜伟华:《砸烂旧世界》, 第 392-399 页。

(11) 详见毛泽东关于各地夺权问题的多次指示, 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 12 册,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12) 董国强:《江苏“一·二六夺权”前后的权力角逐》,《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2007 年 6 月号。

(13) 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第 22、24 和 27 页。

(1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 第 540-542 页,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15)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事件的谈话》, 1967 年 1 月 8 日, 刊载于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2002。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第 35 页。

(16) 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尚未建成, 火车必须通过轮渡横渡长江。南京的武斗阻断了这条动脉, 使得工业重镇上海与华北各地的交通运输彻底中断。这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周恩来为何如此关注南京的局势。关于当时的武斗情况, 详见《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紧急声明》,《八·二七战报》, 1967 年 1 月 5 日, 第一版;《南京十多万革命造反派举行“一·三血案”声讨大会》,《八·二七战报》, 1967 年 1 月 11 日, 第一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第 34 页;《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南京“一·三事件”的平反决定》, 1978 年 12 月 30 日, 刊载于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办公室编:《拨乱反正: 江苏卷》, 第 401-403 页,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 第 541-543 页。

(17)《江渭清给中共中央的特急电报》, 1967 年 1 月 22 日, 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18)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 第 544-545 页; 另见《自绝于人民的江渭清绝没有好下场》,

《农奴戟》，1967年3月8日，第四版。

(19) 耿昌贤访谈，扬州，2007年2月1日。“文革”爆发时，耿是南大外文系法语专科班二年级学生。他参与发起“南大红色造反派”，后来又参与发起“省红总”，并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20) 他是一名退伍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当时30多岁。

(21) 他是数学系团总支副书记、系学生会主席。他和葛忠龙都是“红色造反派”的早期成员。“红色造反派”因自身吸收组织成员的标准较高，于是决定派张建立一个外围组织——“八·二七革命串联会”——以吸引许多希望加入造反运动的群众。后者的组织规模很快便超过了“红色造反派”，并进而与之竞争群众运动领导权。

(22) 关于北京造反派的情况，详见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h.6.

(23) 本段叙述基于葛忠龙访谈，阜宁，2007年4月14、15日。葛是南大数学系高年级学生。1966年12月，他率领一个南大造反派代表团前往北京控告南京地方当局。1967年南京“一·三事件”发生后，他在1月6日、7日和8日连续三次受到周恩来接见。参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0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4) 高啸平“文革”爆发时是江苏省委统战部长。他在1960年代初受到过省委的处理，个人仕途因而大受影响。他的妻子是南大中文系调干生、“南大八·二七”成员。

(25) 梁辑卿是江苏省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杜方平是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大校军衔；吴大胜是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大校军衔。

(26) 这些以《解放军报》记者身份被派往各地的“中央文革”代表在当地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参见 Walder, *Fractured Rebellion*, ch.6.

(27) 《一·二六夺权前后》，《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7日，第二版。

(28) 葛忠龙访谈。

(29) 本段叙述基于曾邦元访谈，南京，2007年11月28日。曾1964年从南大数学系毕业后，留校担任政治辅导员。他在上学期间入党，“文革”爆发时是数学系团总支书记。

(30) 《访问梁辑卿同志记录》，《革命造反报》，1967年2月18日，第四版。

(31) 详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造反就是要夺权！》，刊载于《人民日报》，1967年1月22日，第一版。

(32) 《周恩来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做重要指示》，1967年1月22日，刊载于《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摘录（第三辑）》，第194-195页，未标明编辑出版者，1967年1月印发。

(33) 《一·二六夺权前后》。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38页。

(34) 《夺权记》，《红卫兵报》，1967年2月15日，第一版。

(35) 《一·二六夺权前后》。另见《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0页。

(36) 葛忠龙访谈。耿昌贤访谈。邢文举在回忆录中否认他事先得到造反派方面的通知，不过他暗示南京军区和北京中央确实在事先批准了夺权方案。详见邢文举口述、杨民青整理：《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刊载于《老照片》，第59辑，第6-7页，2008。

(37) 《“文记”夺权委员会罪恶种种》，刊载于《革命造反报》、《东方红战报》、《八·二七战报》、《红卫兵报》联合专刊，1967年2月23日。

(38) 《“文记”夺权委员会罪恶种种》，。

(39) 《惊呼省委书记处》，《东方红战报》，1967年2月9日，第四版。

(40) 《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新华日报》，1967年1月28日，第一版。另见《一·二六夺权前后》。

(41)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页。此前不久，毛泽东曾指示南京军区派部队出席安徽合肥的群众大会，以表明军方的“支左”立场。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第197-198页。

(42)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43页。

(43) 李世英长期在康生手下工作，1960年代初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包厚昌曾任无锡市委书记，“文革”前不久调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经济工作。

〔44〕周恩来还指示在名单中增加葛忠龙，作为反对夺权的造反派代表。周显然不知道，葛事先已经加入“夺权委员会”并成为其核心成员。葛忠龙访谈。《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2-43页。《“文记抢印代表团”究竟是什么货色》，《东方红战报》，1967年3月5日，第三版。

〔45〕葛忠龙访谈。

〔46〕参见《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和《人民日报》，1967年2月4日，第一版。

〔47〕《周恩来谭震林与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座谈纪要》，1967年2月8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8〕《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4页。另见《谭震林陈毅给周恩来的两封信》，1967年2月6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49〕江渭清在其回忆录中非常肯定地说，他从造反派手中获得解救的日期是2月8日。然而这个说法与当时遗留下来的一份史料相互抵触。详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46-548页。另见《“地下省委”复辟记》，《革命造反派》，1968年1月21日，第二至第四版。

〔50〕以下资料记载了2月10日、16日、21日、22日、23日、24日和25日的会议情况：《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星火燎原》，1968年4月25日，第一版；《新华日报究竟是谁家的报纸》，《六·一三战报》，1968年1月23日，第二至第六版；《“地下省委”复辟记》。

〔51〕《触目惊心的资本主义复辟》。

〔52〕参见《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红旗》杂志1967年第4期。该社论还提前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年2月23日，第一版。

〔53〕这篇社论最终发表于1967年3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但是周在2月18日审阅了校样。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9页。

〔54〕葛忠龙访谈。

〔55〕《谭震林是破坏江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井冈山》，1967年6月23日，第三版。

〔56〕杜方平访谈，南京，2007年10月8日。另见《杜方平在京学习会上检讨摘录》，1967年11月12日，刊载于《江苏工人》，1968年3月15日，第一至四版。

〔57〕杜方平访谈。

〔58〕戴国强访谈，南京，2007年7月8日。戴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北京谈判。他是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文革”初期卷入造反运动，后来成为当地支持夺权的造反派头头。

〔59〕《一·二六夺权就是好》，《新华日报》，1967年2月8日，第一版。另见《新华日报究竟是谁家的报纸》；《一·二六夺权前后》；《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5页。

〔60〕参见《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6日）和《周恩来六六至六八年有关江苏省文化革命的部分讲话》，均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1〕耿昌贤访谈。另见《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赴京代表团讲话的纪要》，1967年3月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另见《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七版。

〔62〕葛忠龙访谈。另见《一·二六夺权前后》。

〔63〕曾邦元访谈。葛忠龙访谈。

〔64〕曾邦元访谈。

〔65〕邢文举：《为“中央文革”做记者的日子》（上）。按照邢文举的回忆，高啸平在受到接见时，向“中央文革”领导人转交了南京造反派从省公安厅档案中发现的两封匿名信。据称这两封匿名信的内容显示，江渭清“文革”前曾与刘少奇和周恩来暗中勾结，企图谋害林彪。“中央文革”随即指派高啸平组织一个专案组秘密调查此事。

〔66〕曾邦元访谈。另见《回忆周总理对八·二七的支持和鼓舞》，《八·二七战报》，1968年1月14日，第一版。

(67) 曾邦元访谈。另见《“地下省委”复辟记》。

(68) 《谭震林是破坏江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69) 曾邦元访谈。周恩来可能已经知道高啸平与“中央文革”的幕后活动。据一份史料记载，周曾在2月22日的会议上说：“高啸平历史很复杂”，“这个人不好”，“对我的话添油加醋”。他还说：“我不主张第二次夺权，照高啸平的主张，很想再夺一次！”详见葛忠龙：《高啸平是怎样在江苏复辟资本主义的？——在南大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争反革命两面派高啸平大会上的发言》，《江苏红卫兵》，1968年6月25日，第四版。

(70) 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6-127页。另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pp.191-194。

(71) 详见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pp.194-197；《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9页；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第31-32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72) 《谭震林给林彪的一封信及林彪和毛泽东的批语》，1967年2月17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8页。

(73) 《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29页。围绕“二月逆流”的斗争，显然影响到毛泽东对江渭清复出一事的态度。毛对江一直十分信任，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还曾亲自向他面授机宜。“二月逆流”发生后，毛同意公开批判江渭清，但他多次拒绝江苏造反派把江揪回南京批斗的请求。参见江渭清：《七十年征程》，第526-528页和第548-549页。

(74) 谭震林和江渭清都是湖南人，都在19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新四军时期，谭成为江的顶头上司。1950年代初谭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时，江任江苏省委书记。

(75) 葛忠龙访谈。

(76) 曾邦元访谈。“控告团”后来确实上报了一份材料。详见《给中央文革的一封信——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控告团控告谭震林》，《东方红战报》，1967年6月21日，第一版。

(77)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江苏代表团的谈话》，1967年3月2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78)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5-49页记载了2月8日至3月1日间的八次暴力冲突事件。

(79) 《军级以上干部会议精神传达》，1967年3月，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0)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赴京代表团的讲话》，1967年3月5日，刊载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81)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51页。

(82) 《南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49-50页。另见《周恩来年谱》，下卷，第134页。

(83) 详见董国强：《1967年夏天南京“倒许”风潮的台前幕后》，《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年10月号。另见Michael Schoenhals, “‘Why don't We Arm the Left?’ Mao's Culpability in the ‘Great Chaos’ of 1967”, *The China Quarterly*, No.182(2005), pp.277-300。

□ 来源：共识网

~~~~~

## 【书刊评论】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

• 施滨海 •

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以下简称傅著)自去年下半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香港推出中文版之后，今年元月在中国大陆出版，首版50万册。《人民日报》元月16日率先在要闻二

版发布《邓小平时代》出版中文版消息，6天后又发表记者对傅著作者3000字的专访《告诉西方，一个真实的邓小平》。出版当日，新华社发文《“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让西方世界更了解中国》。24日，《光明日报》紧接着也发表了记者的访问记《傅高义：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竞相报道一个外国学者的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如此盛况，可谓空前。

不管怎样，傅教授自己有言在先，“如果书中史料有误，愿意改正”。为此，笔者想就傅著中提出并贯穿全书主线的“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见傅著第194页、第246页、第247页、第248页）和“在中国人眼里，三中全会标志着使中国转型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开始”（见傅著第246页）以及“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的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来新路线的论坛”（见傅著第239页）等若干重要环节的史实问题与傅教授商榷。

#### ◇ 徘徊就不存在前进

邓小平有没有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中央工作会议有没有为邓取代华提供了推动力，以及在中国人民眼里是不是可以说，三中全会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开始，这涉及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诸多事实和评价问题。

影响至今的说法，认为这两年是徘徊的两年，直到1978年年底才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究竟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以前的这两年？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曾经有过一个基本看法，他说：现在回过来，应当如何估计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呢？我的意见是不是这样说：我们是做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的大事，我们是在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前进的，或者按小平同志说的，我们是在徘徊中间前进的。我们的许多老同志，许多地方党委，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也还是遇到不少的阻力、干扰。这个话究竟怎么说好，应该斟酌。我觉得，把这两年估计得不恰当，可能全党不赞成。（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卷，第74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可见，对于1977、1978这两年如何评价，“徘徊中间前进”也不是一个明确的定论。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华逐渐淡出权力核心以后才形成了“徘徊”论。

其实，胡耀邦后来还说过：“77、78这两年的工作是比较顺心，比较打得开局面的”，又说“怎样评价过去的两年？77、78年是政治大搏斗的两年，是翻天覆地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见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第157页）笔者以为这是胡耀邦放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表白，也是真实感慨。换句话说，没有这两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最终不可能形成三中全会的历史贡献，即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扫除了改革开放与平反毛泽东时代大量冤假错案的意识形态障碍。尤其是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真正贯彻了党内民主政治生活原则，而党的三中全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工作重心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不说正是这两年“扭转乾坤”作用的逻辑结果。

处于当时最高领导地位的华国锋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主张党内思想有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不同观点的交锋，直至斗争，又强调要从团结愿望出发。胡耀邦同志1978年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印证了华国锋同志的亲力亲为。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见《胡耀邦思想年谱》，第212页）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又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根据胡德平同志的回忆，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

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见胡德平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第109页）

笔者在认真阅读傅著中，不仅没有见到上述（包括下文要谈的）这些时间早于2013年元月的史料，相反的是一些由作者编织而成的“解读”。傅著第366页至367页上，为了说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召开的9次政治局会议上，就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职务引起辩论时，作者引用了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部分讲话，而这些“讲话”被修改后，都归之于胡耀邦之口。比如“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做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成就中的作用；由于‘四五’示威活动后形成的政治气氛，逮捕‘四人帮’并不是难事”。

事实上，胡耀邦的讲话是：国锋同志和一些老同志一道，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这是历史事实。我们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这一点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全国人民，包括老同志，确实是真心诚意拥护国锋同志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当时还没有出来工作的小平同志，是写了一封信的，说国锋同志至少可以搞二十年。这个话是真诚的。但是，我觉得，国锋同志没有正确对待一个党员对党和人民应该作出的贡献。

他还讲到：我们反复说，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确实起了一些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减少了我们党和人民的损失，而且处理得很果断，从这一点上讲，是有功绩的。但是，为什么能够不费一枪一弹，一举粉碎“四人帮”呢？这就是当时国锋等同志顺应了党心、民心，再加上粉碎“四人帮”以前，人民群众起来了，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四人帮”当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了，粉碎他们如同摧枯拉朽。说天安门“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这是唯物主义的 analysis，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反过来说，为什么毛泽东同志不能够摧毁所谓“刘、邓司令部”，搞了十年，摧垮不了呢？不是说他老人家的本事不大，而是因为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泽东同志在这件事情上违背了事实，违背了党心、民心。所以，说是“英明领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这个看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错误的。

又比如说到“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错误的阶级斗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胡耀邦的讲话实际是：国锋同志确实另搞了一套，叫做继续批邓，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纪念堂，急急忙忙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急急忙忙号召广大干部为“文化大革命”要三个“正确对待”，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查“谣言”，等等。

傅著接着还说“华国锋对待老干部都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绝为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平反，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

而胡耀邦的讲话却是：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不能解放，这倒还没有，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我就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

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状态，讲得客气点，我看有这么两点：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

对照耀邦同志的那次讲话，傅著中的“引用”，可以说有些是曲解，有些甚至是无中生有。而被作者认为是“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几乎面目全非地出现在读者面前。令人疑惑的是，本来像胡耀邦1980年11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作者完全可以照搬照抄更安全可靠一些，不知作者为何没有这样去做。所以，笔者也只好推想，傅著有意贬低华国锋同志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个人作用。胡耀邦说得很清楚，华没有反对解放哪个老干部，只是“不积极、不热情”，而“不积极、不热情”同傅著中引用的“对待老干部非常粗暴”“害怕老干部复出于干扰他的统治”就不是一回事了。据戴煌的著述，华曾对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说：为什么有些老同志出不来？为何不能互相谅解？习仲勋、宋任穷出来不是很好吗？周惠要到内蒙古去。有些老同志靠边多年，为何不让出来？怕举逸民。这些都是无产阶级的逸民。另据曾志的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的案例座谈会，是华国锋批准的。

胡耀邦、胡绩伟、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还在刚刚过去的“批邓”运动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华以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可谓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对他们“非常粗暴”，也看不出“害怕老干部复出于干扰他的统治”。

值得一提的是，华国锋主持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几处，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保留不删。这样做，是对邓复出的支持还是阻挠？

在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产生分歧意见时，华倒是表现得宽容、克制或者说是息事宁人。比如，傅著中关于华国锋从朝鲜回国后打算在东北停留并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的内容。邓利用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取消了检阅。（见傅著第230页）二十年后，1998年12月7日，苏振华的夫人梅迪伦去看望华国锋时，谈及当年阅兵的事情，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军委主席，但我对部队情况了解很少，刚粉碎“四人帮”时，工作太忙，也顾不上到军队走走。1978年初，叶副主席和军委常委都劝我到部队走走看看，以利以后工作。因此，我先在杨村看了空军飞行部队的汇报表演，当时军委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去了。所以我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没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比较长，按惯例政治局同志离京时间较长，都要向中央报告。在他向我请假时，我顺便告诉他我拟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后来访朝回国后，工作安排太紧，也就没去成。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有人说苏振华同志到我这里告状，根本就没那回事。（见《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第434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显然，倘若当时没有不同看法，也不会有事隔二十年后，旧事重提，华国锋坦露“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心迹，以示自己磊落。所幸傅著已有结论，无须笔者赘言。

#### ◇ 没有叶，邓会受孤立

傅著为使“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的立论能站得住脚，进而推断出中央工作会议成为邓取代华的推动力的结论，在书中披露了一个与其说是鲜为人知的“史料”，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作者自己对当时政治风向的“解读”。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召集的，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自己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而邓小平在11月14日访



问东南亚归来之后，听说北京的气氛已改变，又让他的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紧接着，在写到“叶剑英很快意识到了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之后，作者发挥想象力，用了“于是在11月11日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的爆料。傅著是这样描绘这次私底下的密谈的：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而他们的支持对于领导党和国家至关重要。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间。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作者为了证实自己的“解读”就是“史实”，借用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的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见傅著第231页）这个所谓“小型会议”结果自然而然成为傅著贯穿于全篇的一条主线，如此，邓成为“头号领导人”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在1978年的历史上有没有这样一次由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参加的“小型会议”，笔者在傅著中文版推出前不曾耳闻，出版后几经寻找也未能目睹。在这里，笔者可以断言，无论从目前官方已经公开的档案中，还是相关当事人口述、回忆里，都无法证实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的两年时间里党内高层有过解决华国锋问题的任何动议。

这里，我们再来看一段叶选基的回忆，应该有助于我们对傅著“小型会议”爆料的辨伪。邓小平当年从新加坡出访回京后，曾到军科二号楼与叶帅畅谈，他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进展十分满意。但邓也提出：“现在的宣传有问题，宣传华国锋，抬轿子都抬过河去了，我们现在要强调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党是集体领导，要吸取‘文化大革命’把主席抬到至高无上地位的教训。”叶表示完全同意。两个老聋子说话，声音很大。（见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畅谈”的内容与时间，在《叶剑英年谱》也有所记载，大致与叶选基的回忆相吻合：11月中旬在住所同出访归来的邓小平谈话，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人还谈了中央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突出宣传个人问题。（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卷，第11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邓小平回京的时间是11月14日，按傅著所言，叶与高层的小型会议是发生在11月11日。邓与叶“畅谈”，竟然未能谈及“小型会议”，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诸多疑惑。从历史看，叶对邓是情高义重，更视其为“千秋知己”。“畅谈”中只有邓讲反对突出宣传个人，强调集体领导，云云，而叶仅是附和、赞成，对发生在仅仅几天以前的“小型会议”只字不提，不同被自己视为“千秋知己”的邓交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华和叶帅在邓出来工作前后的讲话和态度。

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华国锋说：“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就要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要马上回来工作，可能要上‘四人帮’一个大当……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事后也曾解释：“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

有利于对‘四人帮’斗争的全局。”而主张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叶剑英当时也说过：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叶还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可见，经过一个过程再恢复邓的工作，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意思，而是高层的共识。（见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年第2期）

至于叶的历史作用，叶选基认为可引用陈云12月10日在东北组的发言，当时陈云针对汪东兴的错误说道：“现在党内议论纷纷，就怕常委出问题，许多同志因叶帅年老了，怕将来要出事，就怕邓小平被再次打倒。”（见《陈云传》）这段话是否可理解为邓当时还不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叶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呢？叶选基的结论是，没有叶，邓会受孤立，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应是陈云同志讲话的本意。（见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南方周末》2008年10月30日）

读了陈云这段话的内容，我们还能对邓小平在1978年已经成为中央头号领导人再说些什么呢？

#### ◇ 华、叶、邓是三驾马车

近年来有人想把邓小平理论的起点溯源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并不赞成。他认为，因为那时邓小平没有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他明确指出：“邓小平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见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210页）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笔者以为，傅著中所指的“头号领导人”应该与龚著中的“实际上的领导核心”意思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似乎还有必要来摘录一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最后一段话的最后几行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根本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之所以要引用三中全会公报的最后几句话，表明华国锋在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党内的地位是稳固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当时的头号领导人。公报的表述是不容置疑的。更何况，三十多年以来，我们党从来没有对三中全会公报有什么评价上的变化。而起变化的倒是，华国锋去世后，过去广为流行的说法，如推行“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崇拜”等等说法，被经官方审定的新华社的生平统推倒重来：

比如，关于粉碎“四人帮”，不只说“有功”，而称华“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起了决定性作用”；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再说“拖延和阻挠”，而说他“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关于经济工作，不再说他“求成过急”，而肯定他“动员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和积极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强调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此外，还提及华在“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推动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等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见《华国锋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8年9月1日）

值得注意的是，傅著英文版出版于2011年，香港中文繁体版出版于2012年，而大陆中文简体版出版于今年元月。光从时间上看，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去梳理、去考证并“为历史做一份生动真实的证词”。

笔者最后认为，不论是三中全会决策，还是改革开放的启动，都是由党的领导集体顺应时代趋势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共同发起和推动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如果从恢复历史真相的意义上讲，在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华、叶、邓是三驾马车，谁也离不开谁，而叶至少起着平衡的作用。回顾历史，我们讲叶、邓等人的功绩，不能也不应该忽视有华国锋的贡献。

（作者为原《中国经济时报》编委）

□ 《炎黄春秋》 2013年第5期

~~~~~

【问责历史】

谁能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

• 文 贝 •

◇ 中南海的“闲人免进”

中南海位于北京古宫西侧，是北京中海和南海的合称，面积约1500亩，其中水面700亩。是中央和国务院办公所在地，也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居住地。

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是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团长张耀祠，团政委是杨德中，副团长兼团司令部参谋长是张宏，副政委兼团政治部主任是王化宇。它的建制归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领导，警卫任务归中央公安部九局领导，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汪东兴是公安部九局（也叫中央警卫局）局长。除四大门警卫外，中央政治局委员级有警卫班，常委级有警卫排，毛泽东和刘少奇是一个警卫中队（连）。

中南海不仅“闲人免进”，即使是住在外面的中央级领导要进来都必须履行一定的手续。然而文革中为什么中南海也有造反派和进驻红卫兵呢？

中南海管不了住在里面的红卫兵。熟悉文革过程的都知道，红卫兵起源于高干子弟为主学校。住在中南海打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子女大部分正处大、中学龄，这些根红苗正的“衙内”消息灵通，又有老辈靠山，最先起事并形成了气候。他们并非是铁板一块，历史渊源和派系区别也分成了许多派别。虽然都有拥护毛泽东的共同点，却在许多政治及人事上存在着历史缘由和现实分歧。由这些高干子弟形成的中南海红卫兵是中南海最不稳定的因素，他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家庭的影响，稍有风吹草动，势必借机而行。

中南海也有群众造反组织。19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下发以后，为了接待全国各地的群众，中央秘书处在中南海西门外搭了接待站，同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

据说最早是因为中央秘书局党委正在酝酿将原机要室的张良源、张振昆和原“后楼”的邢进立、郝锡良等8人赶出中南海，并公开点名宣布停职检查。1966年11月25日，信访处闵耀良等6人首先贴出了题为《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的大字报，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而信访处洪雪竹等9人针锋相对地贴出了《秘书局八月二十一日全体会议好得很》的大字报，反驳闵耀良等人的大字报。从而引起了一场大字报式的争论和五花八门的造反派组织近二十个，最后形成了以闵耀良为代表和以洪雪竹为代表的两大派，分别成立了“中南海红

色造反团”和“中南海红旗造反团”两大“造反派”组织。

1966年12月18日中央王光美专案组成立，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出现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标语。这些事都是中央机关干部干参与下的事，并非全是红卫兵。

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电机系二年级以李振言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采取欺骗的手段把王光美骗了出来进行批斗。据蒯大富回忆：“批斗会还没开始，孙岳（周恩来秘书）就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

周恩来批准红卫兵进驻中南海。据邓颖超秘书赵炜在《西花厅岁月—我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3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文透露：1966年的8月18日以后，“源源不断涌入北京的‘红卫兵’还是住不下，几百万青年学生的吃、住和安全都成了周总理要亲自过问的事儿。没办法。1966年11月16日，周总理批准‘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武成殿和小礼堂等地方，机关的几个工作人员食堂也改为专为‘红卫兵’做饭，我们只好都到警卫部队的食堂入伙。中南海开始接待‘红卫兵’了。”“‘红卫兵’住在中南海期间，周总理曾多次到他们的住处看望，有时他半夜回来也去那儿走一圈，碰上睡觉不老实的孩子还给掖掖被子。邓大姐也以中南海家属的身份去看过‘红卫兵’。”

这个问题应该比较清楚，是周恩来批准红卫兵进驻中南海。

◇ 谁批准批判刘少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

对此，毛泽东1967年1月6日作出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毛泽东一月六日（见毛泽东文稿）

1月7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周恩来到建工学院发表讲话：“主席让我来见大家，有件事情很重要、很急，要马上处理。你们学院有人给中央写了封信，要中央在七日零时将刘少奇交给他们，主席见到后很着急，把我叫了去，让我转告你们，中央不能把刘少奇交出来。我只好把工作放下赶快来见大家，我向有关方面做了了解，知道你们是建工学院的主流派，就把你们请来，告诉你们中央不能将刘少奇同志交给你们，主席不同意嘛！”、“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你们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中央不能将刘少奇交出来。刘少奇同志的问题在十一中全会上已经解决了，不要揪刘少奇。中央对刘少奇同志的问题的精神是只能背靠背的揭发、批判，见不到刘少奇也能批深批透嘛！”（见一九六七年元月七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群众组织“八一战斗团”的讲话）

后来有文章提出是陈伯达于1967年7月中旬在一件关于批判刘少奇的“请示报告”上圈阅同意，并将刘少奇三个字中“少奇”两字勾掉，又在“刘”字后面加上“邓、陶夫妇”四字。此种说法未经证实。

围堵中南海要揪斗刘少奇的是“保皇派”红卫兵“一司”成员。

1967年6—8月间，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新八一战斗团”、“八一战斗团”、“冲锋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揪刘火线指挥部”，并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表示要“坚决揪出刘少奇”。

原因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曾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蹲点。1966年8月2日、3日多次对建工学院“革命团”、“八一团”和辩论会上讲话。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当时主要三个组织，“新八一战斗团”负责人范兴慧、陈朝安、任润玺、蔡海康、孙再权、杜崇凯。“八一战斗团”负责人贾健、董临平、张玉晋、林仲明、郭芳瑞、王成华。“冲锋红卫兵”负责人艾青玉。其中贾健的“八一战斗团”为首，此人曾被周恩来派去上海处理过北京红卫兵事宜，另外许多人都是高干子弟。

熟悉文革的人都知道，1967年初是“西纠”和“联动”最疯狂的历史时期，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负责人是贾健，是保皇派红卫兵“一司”副总指挥，“南下兵团”的“作战部长”，从南方撤回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和表扬。

董临平（女），父亲为军队将领。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学生，1970年在“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中被“审查”，8月4日上吊自杀。

方迪在一篇歌颂“一司”文章《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一司”兴衰始末》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司”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客观上成了周总理的灭火队，哪里有过激行为，周总理就首先想到派“一司”去，“一司”也绝对服从，从未讨价还价。”“一司”的组织成员许多一直坚持到运动后期。后来“一司”消失了，但“一司”的一些影响和好传统还在。像运动后期，不听周总理的劝阻，围攻中南海西门，搞什么揪刘火线这样的坏事。

◇ 刘少奇的批斗都在中南海进行

刘少奇没有被建工学院揪斗，却以公开信方式作了检查。有文章称是1967年7月4日，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当面向刘少奇传达了中央要他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师生写一份检查的意见。

7月9日，刘少奇给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了一份“检查”，经汪东兴交给了北京建工学院。

事实上，刘少奇虽然被定为头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对他的批斗并没有像王光美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彭德怀等那样公开，目前所传的批斗会都是在中南海进行。

刘少奇直到疏散到开封，始终住在中南海的家里，没有进过监狱。虽然北京开过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却没有交群众组织批斗。

中央没有对刘少奇正式立案审查，对他的揭发材料只是交由王光美专案组审查。

◇ 外面的红卫兵进不了中南海

在有些人看来，文化大革命乱的很。中南海已经失控，被林彪和江青等人操控，红卫兵可以肆无忌惮的在中南海横行。其实不然。

在群众组织要揪斗刘少奇时，几万人包围了中南海，聚集在中南海大西门，西北门，南门（新华门）三个大门外高呼口号，除了晃动大铁门以外，根本进不去，或者是压根不敢冲进去。周恩来批准进到中南海安置的红卫兵是各地串联代表，而且是按照部队营、连、排、班的编制组织起来。由部队干部担任连长、排长、班长，中央机关的干部担任指导员。很多人住在走廊里，睡的是地铺。这些红卫兵根本接近不了中央主要领导居住的甲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胡乔木、田家英和卫士长李银桥等）、乙区（邓小平、陈毅、董必武、王稼祥、李富春、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等）和丙区（周恩来、李先念、林伯渠等）这些属于中央办公厅管辖的区域。外面的红卫兵想进去揪斗任何中央领导人都不可能。

刘少奇在中南海的被批斗显然与外面的造反派或红卫兵无关，是“大院红卫兵”或中央机关造反派干的事。外面的红卫兵既使是对王光美批斗，也只能“骗”出来。

在后来的语境里，刘少奇之所以没有被揪斗出来，是由于有周总理的保护。还说1967年初夏北京红卫兵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并冲了进来。周恩来立即赶到，十分严厉地对“造反派”们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不能冲的，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那些冲进中南海的群众，看着威严的总理，接着就退了出去。这种说法有人相信，但笔者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请好好看看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言所行，众所周知刘少奇下台后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仅1966年下半年，周恩来就接见红卫兵组织160余次，仅1970年，周恩来共审批新华社各种稿件四百三十九篇（周恩来年谱统计数据）。而且刘少奇被中央全会最终定性的审查结论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签批的。

◇ 不曝光揪斗刘少奇的罪魁祸首是有苦衷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文革结束后的清查“三种人”，官方也从来没有公开这些批斗刘少奇的当事人，所有的回忆文章除了点出林彪、江青、陈伯达、戚本禹这几个倒霉蛋的名字外，包括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都从来不点名，而是用“造反派”来概括。

谁揪斗的刘少奇，那部分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基本是明摆着的事。戚本禹可能指挥得动造反派，却不一定指挥得动这些“保皇派”“一司红卫兵”，更况且与戚本禹对着干的“联动”红卫兵！

王光美及其子女为什么直到现在仍然坚持毛泽东不想整死刘少奇，并对其后代交好，显然他们心里很清楚是那股力量在整刘少奇。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的真相一旦揭开，社会肯定会再次大吃一惊！

查清谁在中南海揪斗刘少奇并非难事，为什么不追查呢？

□ 文贝博客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 页：//www.cnd.org /
